

# 理论迁移的三个维度:时间·空间·立场

赵 淳

(四川外语学院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市 400031)

**摘 要:**理论迁移通常被认为是发生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然而,通过梳理与研究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中理论迁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可以发现,在关注时间性和空间性之外,还必须对引介西学理论的立场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把握,引介西学的目的不是要充当西方在中国的代言人或传声筒,而是为了我们自身的文化建构。

**关键词:**西学理论;理论迁移;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立场维度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1-0131-05

理论迁移通常被认为是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理论之旅很大程度上乃是无根浮萍,对外来理论的重新语境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多方位、非共时的过程。它既包括全盘照搬和有意无意的误读,也包括在批评意识引导下的解构和重构。无论是上述哪一种,都必然涉及一个接受方的主体意识问题。这意味着,理论迁移中除了时空这两个维度外,还必须考虑第三个维度:立场。我们引介西学的目的并非是要充当西方在中国的代言人或传声筒,而是为了我们自身文化的建构。因此,在关注理论迁移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之外,我们还必须对引介西学理论的立场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把握。

## 一、时间维度:客体与范畴的关联

作为一种存在,理论既是我们认知的结果,又是认知的策略。齐泽克(S. Zizek)归纳道:“存在意味着符号化,意味着融入话语秩序之中:只有被符号化了的事物,我们才能说它存在。”<sup>[1]</sup>因此说理论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而符号从产生之时起,便会因语言的不透明性而暗含多种可能性。在德曼(Paul de Man)看来,“语法模式具有修辞性,这并非是说我们既拥有了字面意义,又拥有了比喻意义,而是说不可能通过语法或其它语言学手段来决定两种(可能是完全矛盾的)意义谁更具优势”<sup>[2]</sup>,他认为修辞在本质上悬置了逻辑,并开启了指涉偏差的多变可能性。这意味着理论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内含着某种歧义性,无论何时何地,理论都不可能完全覆盖其指涉的对象,其中必留有大量的空白和含混。

而在时间线性上,同一理论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遭遇不同的读解和想象,从而造成原有理论的缺失和增补。这显然是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催生的不同的理论诉求和想象来决定的。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把一个时期的全部现象都视为对那个时期的表达,然后在所有个别时期创造一种理想的同时代性。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比格尔(Peter Burger)指出,这种历史主义方法的虚假客观论已经受到了正当的批判:“在那样一种历史化实践中,以前各种理论的片断已经脱离了它们原来的语境,而适应于一个新的语境,但那个断片所经历的功能和意义的变化却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sup>[3]</sup>比格尔要求的是一个外在于历史的位置,即必须超越使认识成为可能的现在。在时间流程中,以前的理论必然存在一个从最初的语境向新的语境过渡、转换和迁移的问题,然而理论却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适应变化了的语境。因此,他认为:“一个客体的展开与一门学科或科学的诸范畴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对这种关联的认识就是这种历

\* 收稿日期:2010-03-10

作者简介:赵淳(1964-),男,重庆市人,文学博士,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当代西方文论和文化批判理论。

史化的意义所在。”<sup>[3]</sup>即是说,对理论话语的历史化,就是对理论客体和理论范畴之间关联的认识。

对于比格尔视阈中的历史线性,霍米·巴巴(H. Bhabha)显然不以为然:“历史正在发生,当然是在理论的书页里发生,在我们为说明历史过程而构建的体系和结构中发生。”<sup>[4]</sup>这种说法,在当今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中颇具代表性。它认为历史就是文本,这些文本在某种意义上等于另一些文本,因此从中不会产生出“真理”的基础。历史是被今天的人们为了今天的目的而建构出来的一种叙事方案。这就顺理成章地封闭了与历史的对话;因为历史是建构出来的一种叙事模式,不具有进行对话的主体资格。所以,德里克(Arif Dirlik)对后殖民主义的非历史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它(后殖民论)强调过去是‘建构出来的’,无法指导未来,并排斥了‘基础’结构、二元对立、本质化身份以及‘人本’主体性等概念,从而把革命活动扫地出门,除非革命作为偶发的可能性。”<sup>[5]</sup>然而,若将理论的时间线性割裂开来,并将其视为种种互不关联的断片,那么理论话语何以根据语境调整和修正自己呢?这相当于是说,在理论的时间维度上,由于时间被分割、被断片化,理论就可不再需要对不同的历史语境做出回应,只需呼应不同的空间碎片便可万事大吉。顺着这样的思路,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卵翼之下生成的种种当代理论所推崇的差异性,便大成问题了——这种差异性,是以时间上的凝固性为前提的。

通过将客体与范畴联在一起以考察理论的历史迁移,比格尔露骨地暗示:客体在现实中自有其外在于理论的存在方式;它在人的认识视野中之呈现,是通过理论范畴的再现来实现的。而在伊格尔顿看来,“文本的对象不是真实,而是使真实得以存在的那些表意活动”,“历史肯定会‘进入’文本,尤其是进入‘历史的’文本”<sup>[6]</sup>。比格尔为这一洞见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理论范畴乃是人类通过语言建构的认识论方案。这些显然在时间过程中不断流变的范畴是通过再现过程建构出来的符号体系。在对文学和文化理论历史性的审视中,关键是考察理论客体(如阶级、族群、性属等)如何在理论范畴中得到再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理论范畴在时间中如何流变,以及这种流变使理论客体的叙述和表征产生了什么样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何种理论诉求和理论想象,在具体历史事件和理论想象之间存在何种互动、呼应和关联。

## 二、空间维度:时空压缩与批评意识

时空压缩乃是技术、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它是我们研究理论迁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认识论前提之一。

叙事学学者马克·柯里(M. Currie)建议,对时空压缩“有兴趣的读者最好从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性的状况》开始”<sup>[7]</sup><sup>105</sup>。哈维(D. Harvey)在此书中对时空压缩及其后现代回应作了十分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虽然空间和时间概念是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它们与客观事实的全体力量一起运作,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此一来,便产生了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时尚、产品、生产技术、劳动过程、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和各种被建立的实践的易变性和短暂性。”<sup>[8]</sup>这种易变性和短暂性使得人们很难再持有任何一种关于连续性的坚实感,过去的经验被压缩进了某种压倒性的现在之中,连续性受到威胁甚至遭到破坏。

传统的线性叙事已很难在时间维度上将事件组织起来,事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受制于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的封锁。对“叙事被时空压缩的过程以某种方式消解了”这种观点,马克·柯里显然是不接受的,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后现代的论辩中有的叙事较之别的叙事更成了牺牲品”,“宏大叙事成了批判对象,而小叙事则依然故我”<sup>[7]</sup><sup>106</sup>。在某种意义上,叙事从时间转向了空间,从宏大转向了细微。这正是苏贾(E. W. Soja)所试图阐释的:“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历史叙事,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摆脱传统批判理论类乎于监狱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借此给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留下空间。”<sup>[9]</sup>对空间的强调,乃是时间连续性遭到破坏之后所必然面临的选择之一。然而,空间的组织方式由于其显见的无序性,虽然有利于再现和描述瞬时性、破碎性、断裂性、偶然性、差异性和歧义性,但也很容易造成总体规划的缺失。但这之间的张力如何才能得到合理的调和与解决,苏贾似乎并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1974年,列斐伏尔(H. Lefebvre)在其《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提出了“空

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如今学界已是耳熟能详的论断。近年来,“空间”一词被广泛运用,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含义。空间成为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能有效地介入诸如身份、权力、记忆、归属、话语、立场等众多研究论题。从认为空间是地域存在的传统地理学,到认为空间是社会存在的后现代地理学,再到认为空间是文化存在的文化地理学,发展到晚近出现的认为空间是社会、文化和地域的多维存在的新文化地理学,学界越来越关注文化的空间性和空间的文化性,致力于说明空间是如何成为一种建构文化体验意义地图的核心力量。对此,列斐伏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空间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它实际上是充溢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sup>[10]</sup>这一论述奠定了当代空间认识论的基础,此后的空间理论家如哈维和苏贾等人基本上都以此为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此外,詹姆逊(F. Jameson)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亦指出:“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心理经验和文化语言都已让空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sup>[11]</sup>这说明空间本身已远非一个纯粹外在于意识的地理范畴。因此,理论在空间中的迁移,本身必然会内含某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选择。

问题是,这种选择的支点何在?

赛义德(E. W. Said)1982年在*Raritan Quarterly*季刊上发表的著名论文《理论旅行》,是他主要在空间维度上对理论迁移进行研究的代表作。在此文中,赛义德尤为注重理论迁移中的误读和误释,倡导在“唯唯诺诺地照搬字句”和“创造性的误读”之外,寻求“中间的可能性”<sup>[12]</sup><sup>148</sup>。他拒斥那种认为对外来理论的借用、阅读和阐释要么是全盘照搬、要么是创造性误读的激进观点,希望在这两极之间引入第三种视角,亦即他反复推崇的批评意识:“批评意识就是对各种情境之间的差异的感觉和意识,同时也意识到任何体系或理论都不能穷尽它所出自或它被植入的情境。而且最重要的是,批评意识要感觉和意识到那些具体经验或与理论冲突的阐释对理论的抵抗和反动。”<sup>[12]</sup><sup>153-154</sup>在1992年的《理论旅行再思考》中,赛义德对《理论旅行》进行了反思。他雄辩地论证了阿多诺在其美学和音乐的理论中对卢卡奇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所做的改写甚至颠覆,并梳理了法农利用物化理论对殖民主义所做的深刻阐释,然后概括道:“因此理论的要点是它始终在旅行,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向外迁移,并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中。”<sup>[13]</sup>这里,与其将“理论始终在旅行”这一观点看成是他在此文中所要达成的理论目的,毋宁说这是赛义德对理论迁移的空间性的强调更为妥帖。最后他总结道:“在这个词的最深邃和最有趣的渊源处,尤其存在一种智识的——也许道德的——奇妙共性。”<sup>[13]</sup>这个令人困惑的“道德共性”(moral community)是一个很含混的表述,尤其是当我们将其与赛义德常用的“批评”、“斗争”之类字眼两相比对,这种含混性尤显突出。毫无疑问,批评意识乃是赛义德词典中最常见的词组之一。在激进的《知识分子论》中,他就提出:“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憾的权力而丧失天性;而是……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sup>[14]</sup>然而,批评的目的,显然不会仅仅是单纯地令权势不快那么肤浅。批评必须要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参照系,所谓批评,不过就是以这个预设参照系为标准所做出的价值判断。

福柯提醒我们说:“当我们要谈论‘作品’时,在此处和彼处的意义并不相同。作品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直接的、确定的或一个同质的单位。”<sup>[15]</sup>这一洞见显然直接支持了理论迁移的空间维度及其包含的意识形态性。但若我们期待福柯能进一步就立场问题说点什么,那多半是会失望的。在福柯的领域中,“为了分析对肉体的政治干预和权力微观物理学,在权力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暴力—意识形态对立、所有权观念、契约和征服模式”<sup>[16]</sup>,也即是说,所有与社会历史阶级等相关的东西,都应被放入括号悬置起来。相比之下,当赛义德宣称要“弄清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sup>[12]</sup><sup>138</sup>时,学界当然有足够理由为这一取向欢呼。赛义德在两篇关于理论旅行的论文中告诉了我们理论总是在“流亡的状态中”,他甚至还建议接受方需特别关注批评意识。但我们仍然不能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答案,因为他对批评所应有的参照系始终语焉不详<sup>[17]</sup>,这就令人对批评意识的支点何在始终充满迷茫。

### 三、立场维度:公共关怀与文化建构

当下的知识分子不再受到对知识的世俗奉献的支配,“现已被行业成就和专业进取的精神所取

代”<sup>[18]</sup>。在某种程度上,批评逐渐从一种旨在改变人类生存状况的公共行为向一种谋生之道转变<sup>[19]</sup>。在此笔者想到了海德格尔那把绝妙的壶。壶的本质不在于它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而是壶壁围拢的“虚空”,亦即“无”<sup>[20]</sup>。物当然可以被当作一个具体的“什么”(如壶),但“什么”却不是物的本性。同理,立场维度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把它叫做什么(譬如批评意识),而在于当其在时空中迁移而来时,我们所赋予它的那种内在的理论指向力和驱使力。批评意识只是理论接受的策略,它可因谋生而为,亦可因某种公共关怀和文化建构的追求而为。本文所研究的立场维度,系指后者。

仅有批评意识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只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而立场与认识论或本体论相关。但立场却并非是一个只要你提到它,它就对你透明的存在。在其背后,隐含着理论想象、知识结构、学术话语、无意识欲望、经验惯性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动因。齐泽克提出“未知的已知”(the unknown knowns),即那些“我们拒不承认的信念和迷信,我们甚至还没意识到它们与我们紧密相连且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和情感”<sup>[21]52</sup>。这意味着,人们并不总对支撑其做出批评的东西了然于胸。“人的欲望就是大写他者的欲望”<sup>[22]</sup>;拉康的大写他者(the big Other)据说运行在象征的层面上,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下棋时必须遵循的规则。规则是无形的,但却时时规定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欲望是一个很难从主体本身去界定的范畴。但要标示出它的位置,也并不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拉康建议去他者那里寻求答案。那么以“文化”范畴为例。西方理论大师们关于文化的定义汗牛充栋,另类的齐泽克却说:“‘文化’就是所有那些我们虽身体力行但却并不真正相信的事情的名字,我们并不把它们太当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将那些原教旨主义的信徒们看成是‘野蛮人’、反文化者,将其视为对文化的威胁——因为他们胆敢把他们的信仰太当真了。”<sup>[21]31</sup>这样的判断,是否会给某些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的学者几分尴尬呢?这里,笔者回想起了由张旭东和德里克主编的、收录了多位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后现代性研讨论文的《疆界2》(boundary 2) 1997年秋季专号。他们认为中国的后现代性所代表的是后期社会主义或革命以后的现象所表现的一些行为和模式,并力图证明事实上后现代性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名词。在一片喧嚣之中,似乎差点就在文本与话语中将1990年代的中国提前送进了后现代。在拉康那里,大写他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却可以“被拟人化或被物化”<sup>[21]9</sup>。如此,缺乏自己的理论话语的中国学者,在“文化”和“后现代”题旨上所作的判断,有意无意间不正是为了迎合西方这个“大写他者”吗?如是观之,在理论迁移中,接受方如果没有鲜明的文化立场,方法论范畴的批评意识很可能就会一跃而成为本体,其结果就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为了混口饭吃而批评。

当西方理论脱离原有语境,被压缩进中国学界的接受视野之时,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抱何种态度对这些西方理论加以审视、整理、阐释和再现。尼采说这是一个视角主义问题:“阐释世界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我们的欲望……而每种欲望都有其视角。”<sup>[23]</sup>学界对西方理论的引介,由于视角、立场和策略的不同,必然会存在种种被遮蔽的阴影,使得观照的客体呈现出繁复样态。我们引介西学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自身的文化建构所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所处的语境有一个清醒的判断。西方理论的传承乃是其自身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其产生、发展、深化和消退的过程无不刻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当中国学界致力于引介西学理论时,必须认识到,这些迁移而来的西方理论乃是剥离了它生成于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的无根漂移。因此,作为理论迁移的接受方,我们必须既要强调理论旅行的时间和空间差异,更应明了我们接受西方理论的文化立场。

考虑到在理论进出口中,我们处于入超的状态,费斯克(John Fiske)提出的文化经济商品“不是意义和愉悦的包装和载体,而是意义的激发者(provokers)”<sup>[24]</sup>这一洞见,便具有可资借鉴的学理意义。即,我们不能把迁移而来的西方理论当作成品来接受和消费,而应将其视为对我们自身理论建构的一种激发者和催化剂。我们必须要有—种建构和重构的姿态。某些学者希望借西方理论范式阐释和解决中国的文化建构问题,也许在根子上就踏上了歧途。从本质上说,我们和西方学者的理论研究之不同,正在于文化理论建构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自我陶醉式的话语把玩,而是具有某种本体论基础。我们投身世界理论旅行大潮的背后,乃是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要求重新划分世界文化疆界的诉求,这是一个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交织之中的文化姿态问题,也是我们应取的立场。

## 四、结束语

时空压缩和无根漂移是笔者研究理论迁移的两个基本前提。詹姆逊说“历史并非完全是一个文本，毋宁说是一个即将被建构(或重构)出来的文本”<sup>[25]</sup>，理论亦然。这启示我们，在接受西方理论之时，我们必须抱有公共关怀和文化建构的态度与立场，将迁移而来的理论视为对自身理论建构的催化剂和激发者；同时，在时间上，通过审视理论范畴与其客体之间的历史性关联，切实研判理论背后的文化欲望、理论想象、话语实践、研究范式和个体经验；在空间上，要充分认识到，理论的空间排列很容易造成总体规划的缺失，而总体规划是公共关怀和文化建构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理论具有无穷的开放性，只有在时间、空间、立场三个维度上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在学理层面上将外来理论与自身语境、话语实践和主体认识、宏观视角和微观考察、人文激情和形式分析、抽象思辨和文本实践整合起来，并使之朝着有利于我们自身文化建构的方向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斯拉沃热·齐泽克. 快感丛林[M]//齐泽克. 实在界的面庞. 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61.
- [2] Paul de Man. *Semiotics and Rhetoric*[G]//Josue Harari, ed.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m Criticism*. London: Mcthuen, 1980:130.
- [3] 彼得·比格尔. 先锋理论与文学批评科学[G]//弗朗西斯·马尔赫恩,主编.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陈永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9.
- [4]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Routledge, 1994:25.
- [5] 阿里夫·德里克. 后殖民还是后革命? 后殖民批评中历史的问题[M]//后革命氛围. 王宁,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101.
- [6]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72.
- [7] Mark Currie.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M].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 [8]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M].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5:285.
- [9] 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M]. 王文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
- [10] Henri Lefebvre.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J]. trans. M. Enders. *Antipode*, 1976b(8):31.
- [11]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16.
- [12] 爱德华·W·赛义德. 理论旅行[M]//赛义德自选集. 马海良,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3] Edward W. Said. *Travelling Theory Reconsidered*[G]//Simon During,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Thir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252.
- [14]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Intellectual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97.
- [15]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trans. A. M.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24.
- [16]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28.
- [17] 赵淳. 反思与质疑:萨伊德与萨伊德东方主义[J]. *外国文学*,2007(2):103-108.
- [18] Richard Wolin. *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2.
- [19] 赵淳. 梳理与质疑:文化批判的立场[J]. *国外文学*,2008(4):10-14.
- [20] 海德格尔. 物[M]//海德格尔选集:下册.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169-1173.
- [21] Slavoj Zizek. *How to Read Lacan*[M]. London: Granta Books, 2006.
- [22] Jacques Lacan. *Subversion of Subject and Dialect of Desire*[G]//*Ecrits: A S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345.
- [23]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M]. Trans. Walter Kaufmann &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Knopf and Random House, 1968:267.
- [24] John Fiske. *Television Cul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313.
- [25] Fredric Jameson. *Imaginary and Symbolic in Lacan*[M]//Michael Hardt and Kathi Weeks, ed. *The Jameson Reader*. UK,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109.